

文明城市创建促进了资本跨区域流动吗

——来自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证据

白宗航¹ 王树森² 田一迪³

(1. 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3.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城市品牌是保持和增强城市竞争力、吸引企业投资和打破区域间资本流动障碍的重要手段。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衡量资本跨区域流动,考察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文明城市创建显著推动了资本跨区域流动。机制分析表明,文明城市创建通过改善地区社会信用环境和提高地区政务服务水平促进了资本跨区域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文明城市创建有效约束带有污染性质的资本跨区域流动。相比于中心城市和沿海城市,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提升作用在外围城市和内陆城市中更显著。此外,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推动能够进一步提高城市创业活力和就业水平,从而起到“稳就业”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政府部门利用城市品牌畅通资本跨区域流动和实现中国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关键词:文明城市创建;资本跨区域流动;社会信用环境;政务服务;稳就业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5)04-0081-13

一、引言

畅通资本跨区域流动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当前,受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和逆全球化趋势影响,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已成为释放国内市场潜力、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路径。在这一背景下,畅通资本跨区域流动、减少资本流动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制度性障碍对于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然而,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地理距离、制度差异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国内市场长期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1],这不仅导致企业跨区域投资面临诸多障碍,而且阻碍了资本跨区域流动。

收稿日期:2024-1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21&·ZD1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产业基因赋能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路径与政策研究”(22CJY025)

作者简介:白宗航(1994—),男,山东临沂人,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王树森(1994—),男,山东济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讲师;

田一迪(1998—),女,河南郑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本文通讯作者。

城市品牌建设作为树立良好城市形象、强化城市竞争力的手段,已经成为各城市的重点建设内容^[2]。其中,“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简称中央文明委)颁发,旨在激励各城市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及生态文明等多个维度实现均衡与和谐发展,最终达成城市核心竞争力与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文明城市”评选于2003年启动,测评内容涵盖政务服务、法治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考评标准严格,已成为目前我国含金量最高的城市品牌^[3]。近年来,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经济效应受到学术界的关注^{[4][5]}。然而,鲜有研究考虑到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产生的影响,而企业异地设立子公司正是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典型微观表现^[6]。那么,文明城市创建能否成为吸引异地企业设立子公司的因素,从而实现资本跨区域流动?其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如何?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一系列问题。

文明城市创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跨地区投资决策并降低了异地企业进入难度,从而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一方面,文明城市对社会信用、营商环境、人文与社会环境提出了基本要求,有助于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7],打破区域间信任缺失与制度壁垒,降低异地企业进入成本,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另一方面,文明城市创建促使地方政府优化行政审批、强化政务信息化建设、深化便民服务,从而提升政务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8],增强企业跨区域布局的信心与能力,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此外,创建文明城市对官员晋升具有激励作用^[9],地方政府因此展现出更强的目标导向和投资建设动能,积极招商引资,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然而已有研究对于城市品牌如何通过制度环境改善引导资本跨区域流动,仍缺乏关注。

为此,本文基于2000—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数据和地级市层面数据,以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衡量资本跨区域流动,并利用“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全面考察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区别于现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从城市品牌视角探讨资本跨区域流动,扩展和丰富了现有关于资本跨区域流动的相关研究。既有研究证实了产业政策、制度差异、基础设施建设、地区间信任和财政激励等因素在引导和决定资本跨区域流动中所发挥的作用^[10],但针对城市品牌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问题,仍缺乏探讨。本文借助“全国文明城市”这一城市品牌,构造城市对维度数据刻画资本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过程,不仅给出了城市品牌引导资本跨区域流动的直接证据,还为全面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创新城市治理模式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二,丰富了文明城市评选经济影响领域的文献。既有文献主要关注文明城市评选对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两方面产生的影响,但针对由企业异地设立子公司的微观行为而引发的资本跨区域流动这一宏观问题的讨论较为匮乏。本文重点关注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并从地区社会信用环境和政务服务质量两方面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拓宽了文明城市创建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边界。第三,识别了“文明城市”评选这一全国普及的综合性试点举措在引导资本跨区域流动中所带来的政策影响,既打开政府部门这一“看得见的手”引导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黑箱”,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内市场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也为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构建本地城市品牌招商引资提供理论支持。同时,本文还验证了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提升作用在提高城市创业活力和稳就业方面的经济影响,对于地方政府通过构建城市品牌,最终实现稳就业、保民生的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1.关于资本跨区域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

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资本跨区域流动对于推动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资本国际流动在连接国内和国外经济金融活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现有学者针对国际资

本流动的驱动因素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包括全球风险偏好、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世界利率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等影响全球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外部因素^{[11][12]},以及经济基本面、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主权风险和利率等经济体内部因素^{[13][14]}。

我国学者广泛借鉴跨国资本流动的相关理论和分析范式,基于微观企业异地设立子公司视角对我国地区间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因素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已有研究发现,区域间市场分割、自然地理距离和行政边界、地区间信任的不足导致企业在跨区经营时需要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搜集成本,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跨区域扩张和资本在不同区域之间自由流动^[15]。而不同地区间在文化、方言上的差异,使得资本在跨区域流动时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化形态和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上的冲突^[16]。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异地商会设立,推进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极大降低了资本跨区域流动面临的一系列障碍,为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提供了外部环境支持^{[17][18]}。同时,部分学者发现地区社会网络、高管异地联结和家乡情结也会在正式制度缺位时,成为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驱动因素^[19]。此外,企业数字化改革降低了企业进行异地投资时面临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内部组织经营效率,是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重要推力^[6]。银行业竞争也缓解了企业异地投资时的融资约束问题,银行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会带动资本跨区域流动^[20]。综上所述,学者们围绕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因素展开了一系列探讨,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2.关于文明城市创建经济效应的研究

城市品牌是保持和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地区间战略关联和积累高端生产要素的关键手段,是各地城市建设的重要方向^[2]。我国政府正积极筹划并实施各类城市荣誉评选项目,激励各地区踊跃参与城市品牌建设,共同推动城市形象的全面提升。近年来,我国先后开展了智慧城市、创新型城市等城市品牌评选活动,相关学者也探讨了不同城市品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21][22]}。这些城市品牌政策均致力于提升城市软环境、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体现出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方向。例如,智慧城市政策侧重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应用场景落地,重点在于推动政务、交通和物流等环节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创新型城市强调科技资源集聚与高新产业培育,通过财政补贴、科研激励等方式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相比之下,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更聚焦于制度规范和社会秩序建设,通过政务服务、信用环境等方面的综合考核,引导城市提升制度化治理水平。

作为创建难度最大、层次最高和含金量最重的城市品牌,全国文明城市已成为入选城市重要的无形资产和战略资源。文明城市创建强化了城市的核心竞争优势、提升了城市综合实力,为当地带来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诸多学者开始探讨和识别文明城市创建所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效应。就宏观层面而言,文明城市创建有助于推动地方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并在就业促进、科技进步和生态改善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相关研究发现创建文明城市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活力与就业水平^{[2][23]},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24],并减少了城市空气污染和碳排放^[25]。在微观层面,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经营和生产方面的影响。文明城市创建通过改善当地政务环境、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能有效降低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改善生产经营环境,助力企业实现利润增长^[26]。同时,文明城市创建提高了本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5],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助力^[4]。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相关研究讨论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跨地投资决策的影响^[27]。尽管企业跨地投资被视为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重要微观表现形式^[6],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分析,未能进一步从企业跨地投资视角刻画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特征。相比之下,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与资本跨区域流动的直接证据,可纳入资本跨区域流动问题的讨论。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对于城市品牌如何通过制度环境改善引导资本跨区域流动,仍缺乏必要的直接识别证据。文明城市创建的核心在于通过改善政务服务和社会信用环境,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和促进招商引资,这不仅解决资本跨区域流动过程中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和交易成本问题,也为本文借助“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这一准自然实验识别出政府部门这一“看得见的手”在引导资本跨区域

流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合适的现实场景,增强了研究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文明城市创建能够通过改善地区社会信用环境,减少企业异地投资的制度性障碍与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区域间市场分割与双边信任缺失是影响企业异地投资和资本跨区域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距离导致企业在跨区域经营时不得不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搜集成本,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跨区域投资和资本在不同区域之间流动。而文明城市创建对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会减轻企业异地投资时面临的双边信任缺失和信息成本较高等负面因素的影响。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对参评城市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商环境优化和人文氛围塑造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并通过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综合评价。一方面,文明城市要求建立覆盖广泛的社会征信系统,推动工商登记和纳税信用等核心数据的互联互通,从而压缩信息验证成本;另一方面,文明城市推动建立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包括“红黑名单”制度、失信整治专项行动等),强化信用体系的运行。此外,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还需完善投诉监督机制,并开展虚假广告等领域的专项整治,这有助于推动形成诚实守信的商业氛围。可见,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敦促地方政府积极投身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降低了市场道德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营造了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信用环境。地区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增强地区间信任^[28],打破区域间长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障碍。从文化氛围的角度,上市公司的异地投资决策受到公司管理层对于目标地区信任程度、两地之间的文化偏见的影响,而文明城市创建有助于塑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打破潜在的文化偏见,提高合作的可预期性。例如,在签订商业合同、开展供应链合作等经济活动中,基于诚信的文化环境能确保合同顺利履行。因此,诚信的文化氛围能提高上市公司对目标异地子公司所在地的信任程度,推动其向目标地设立子公司,从而实现资本跨区域流动。从市场规范的角度,文明城市创建通过反向惩戒机制、专项整治行动和失信联合惩治的有力措施,对违规失信行为形成威慑作用,有助于营造更加规范、透明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市场中的企业也更倾向于通过合规经营、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等正当方式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非诉诸不正当竞争手段。这种良好的竞争氛围有助于增强异地企业的市场信心,推动企业开展跨区域经营。从交易风险和成本的角度,地区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还可以减少经济活动和联系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信用风险和交易费用,降低异地企业进入难度和成本,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此外,地区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异地企业获得本地银行信贷的可能性,通过减轻企业贷款成本和放宽对贷款抵押品的要求,显著降低异地企业在寻求融资时因缺乏本地适宜抵押物而加剧的借款难度,为异地企业顺利进入市场、开展业务活动畅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吸引异地企业进入,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

文明城市创建通过提升政务服务质量与优化制度供给,构建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从而提升异地企业的进入意愿,推动资本实现跨区域流动。一方面,文明城市创建通过晋升激励效应提升政务服务质量。中央文明委和各级地方政府会对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及在创建过程中表现卓越的贡献者给予相应的奖励,这将对地方政府官员产生明显的晋升激励^[29],推动地方政府围绕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切实改善政务服务与营商环境。在晋升激励机制驱动下,地方政府往往展现出更强的目标导向和政策执行力,围绕行政效能、服务便利化和制度规范化等重点领域推进改革举措,推动形成更加廉洁和高效的政务环境。在此基础上,各地会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吸引异地企业进入,从而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另一方面,文明城市创建对改善地方政务服务提出了基础性要求和量化标准:在事项审批方面,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压缩审批时限,优化审批程序;在信息披露方面,推进政务透明化、公开化,公布权力清单,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积极推进责任清单工作,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在企业权益维护方面,要求政府“无乱摊派等增加企业负担现象”,从而提高政府廉洁程度,帮助企业减少不必要的支出,降低交易成本。文明城市评比还将群众对党政机关、反腐倡廉和政府诚信等方面的满意度作为硬性考核指标,中央文明委也会对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服务单位进行随机实地考察。可见,文明城市的创建实质上推动了地方政府完善行政审批制

度、推进政务信息化和便民化等“放管服”改革举措,极大地改善了政务服务,逐渐形成廉洁高效的地区政务环境。尤其是很多城市为积极响应全国文明城市评价体系中关于构建清正廉洁、高效运作的政务服务环境的号召,纷纷启动一系列以“比服务、比效率、比作风”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建设举措,不仅提升了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也加速推进了政府诚信体系的建立健全。地区政务服务水平和政府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优化了当地营商环境,使异地企业在进入市场、接受市场监督管理、办理纳税等多个环节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减少,交易成本得以降低,从而降低异地企业进入难度,增强企业跨区域投资的信心,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

综合上述分析,文明城市创建通过完善社会信用机制与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为企业跨区域设立子公司、拓展异地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行为动因。一方面,信用环境的优化降低了企业在异地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了文化隔阂与交易风险,有助于打破区域间的制度壁垒与非正式约束,增强企业对外地投资环境的信任与预期稳定性;另一方面,政务服务的高效透明不仅提升了政府办事效率和企业办事便利度,还通过优化行政流程、强化制度供给、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为企业提供了更具吸引力和可预期性的制度环境。社会信用环境的完善和政务服务水平的提高,共同构建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推动企业将资源从原有区域配置至营商环境更优、治理水平更高的文明城市,实现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文明城市创建有助于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

H2:文明城市创建通过改善地区社会信用程度,吸引异地企业进入,从而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

H3:文明城市创建通过提高地区政务服务水平,吸引异地企业进入,从而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衡量资本跨区域流动,考察目标地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所用到的数据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地理和财务数据,此外还有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所在地的宏观经济特征等数据。上市公司地理和财务数据来自希施玛(CSMAR)数据库,文明城市创建数据通过手工整理从中国文明网获得,宏观经济特征数据来自 EPS(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数据库,并根据各地级市统计年鉴补齐。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考虑 CSMAR 等数据库披露和统计上市公司子公司相关数据的起始年份为 2000 年,因此本文将样本起始年份确定为 2000 年。同时,考虑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在新冠疫情时期公布,为了比较出各届文明城市政策冲击前后各年度的动态效应,本文仅以前五次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作为政策冲击,将研究样本区间选为 2000—2021 年。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地区间资本跨区域流动。针对地区间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测度,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一是以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衡量资本跨区域流动^[30];二是以上市公司异地并购事件表征资本跨区域流动^[31]。然而相比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披露,上市公司设立子公司的数据较为完整和全面,这导致现有研究在探讨资本跨区域流动问题时,更倾向于以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进行表征。因此,本文使用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的数量衡量资本跨区域流动。具体地,本文借鉴曹春方和贾凡胜^[17]的做法,将母、子公司地理信息汇总到城市层面,构建城市配对样本,进一步得到母公司所在城市 i —子公司所在城市 j —年份 t 的面板数据(以下简称城市对层面数据),其中 $Cross_firm_{ijt}$ 代表位于 i 城市的所有上市公司于 t 年在城市 j 设立的子公司数量,用于衡量资本跨区域流动。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对位于 i 城市的所有上市公司于 t 年在城市 j 设立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取对数($Cross_invest_{ijt}$),作为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替代变量。同时,本文还将上市公司、异地

并购企业地理信息汇总到城市对层面,分别以*i*城市的所有上市公司于*t*年在城市*j*异地并购的企业数量和*i*城市的所有上市公司于*t*年在城市*j*的异地并购金额取对数衡量资本跨区域流动,进行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Civil_{jt}$)为异地子公司所在城市*j*是否在*t*年获评为全国文明城市,通过手工整理中国文明网公布的各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所得。具体变量定义为:若城市*j*在*t*年获得文明城市称号,则在*t*年及之后的年份均取值为1,否则为0。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考虑到文明城市评选的公示时间并不固定,本文将上半年公示当选认定为当年,将下半年公示当选认定为下一年。其次,考虑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大直辖市在每次文明城市评选中均是以各城区入选文明城市单位,并不是整个城市获得文明城市称号,故本文的研究样本不包括四大直辖市^[3]。最后,考虑到“全国文明城市”评比存在严格的复查机制,部分城市未通过后续的复查会丢失文明城市称号,直至其重获文明城市的资格,这便导致部分样本城市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跳跃”。有鉴于此,为了防止该“跳跃”样本的存在导致估计偏误,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8],将在样本期内因复查审核未通过而被撤销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以及复评重新获取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均进行剔除。

3.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已有研究^[19],分别控制上市公司所在城市和异地子公司所在城市的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土地成本、金融发展、法治环境、平均工资、规模工业企业数量、空气质量和医疗条件。限于篇幅,上述变量定义及构造方法未展示,留存备索。

(三)识别策略与模型设定

考虑到“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是一个动态过程,一定程度上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为解决基准回归结论可能因样本选择偏差而存在的估计偏误,并更好地保证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在文明城市评选前具有更严格的相同趋势,本文参考现有研究^[29],先将各届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作为处理组,采用逐届匹配和1:4最近邻匹配相结合的方法,以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从未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对照组城市中为每一届获评的文明城市匹配出相应的对照组,匹配后,各匹配变量在对照组样本与处理组样本中均值相近,并通过了平稳性检验^①。

本文通过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识别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基准回归模型为:

$$Cross_firm_{ijt} = \beta_0 + \beta_1 Civil_{jt} + \beta_2 X_{it} + \beta_3 X_{jt} + \theta_{ij} + \delta_t + \epsilon_{ijt} \quad (1)$$

式(1)中,下标*i*和*j*分别代表上市公司和其异地子公司所在城市,*t*为年份。 $Cross_firm_{ijt}$ 代表位于*i*城市的所有上市公司于*t*年在城市*j*设立的子公司数量; $Civil_{jt}$ 为异地子公司所在城市*j*是否在*t*年获评为全国文明城市; X_{it} 和 X_{jt} 分别代表上市公司所在城市*i*和异地子公司所在城市*j*在*t*年的宏观层面控制变量; θ_{ij} 为城市对固定效应; δ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ϵ_{ijt} 为随机扰动项,并将标准误聚类调整到城市—城市对层面。 β_1 是本文最关心的估计系数,其经济含义为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第(1)(2)列以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的数量衡量资本跨区域流动,第(3)(4)列以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注册资本的对数值衡量资本跨区域流动。可以发现,文明城市创建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文明城市创建会显著促进异地企业进入和增加异地投资额,即文明城市创建有助于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支持了本文提出的H1。

	(1)	(2)	(3)	(4)
	Cross_firm	Cross_firm	Cross_Invest	Cross_Invest
Civil	0.4689 *** (0.0285)	0.4154 *** (0.0260)	0.6948 *** (0.0319)	0.6364 *** (0.0308)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对/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42604	1342604	1342604	1342604
Adjusted R ²	0.4634	0.4734	0.5368	0.5463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对层面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图 1 直观反映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这一政策冲击前后各年度的动态效应。在参与文明城市创建之前,各期系数均不显著且置信区间包含 0,说明进入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城市在资本跨区域流动方面均无明显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而在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及之后,各期系数的置信区间均显著为正,且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提升作用呈逐渐加强的态势。

(三)稳健性检验^②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1. 置信区间敏感性分析

考虑到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存在一定的事前趋势,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参考相关研究^[32],假定在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时,对政策冲击后两期进行了置信区间敏感性分析。

2. 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

考虑到基于双向固定效应的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量(TWFE)可能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和负权重问题,本文借鉴 Goodman-Bacon 的研究^[33],对文明城市创建的资本跨区域流动提升作用进行了 Bacon 分解。同时,本文分别进行了基于逆概率加权法的加权双重差分(CSDID)和堆叠双重差分(Stacked DID)的“异质性—稳健”DID 估计检验。

3. 工具变量估计

考虑到反向因果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选取以下三个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一是根据是否为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河流沿岸城市构建虚拟变量,并将其与时间趋势项交乘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工具变量。二是计算本省内首个获得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到本城市的地理距离,再计算上一年度本省获得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占比,将二者相乘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工具变量。三是基于城市在样本起始年份时的城市特征和各届评选时所对应的各城市特征的权重,构造城市在历届评选中入选文明城市的概率,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工具变量。之后,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4. 替换资本跨区域流动的衡量指标

考虑到资本跨区域流动指标构建时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问题,本文替换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测度方式如下。第一,本文剔除母公司控股比例小于 50%的子公司样本,重新以母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数量和异地设立子公司注册资本的对数值衡量资本跨区域流动。第二,为了规避历史投资的影响,本文以母公司所在城市当年在异地新建子公司数量和异地新建子公司注册资本的对数值衡量资本跨区域流动。第三,本文以上市公司异地并购的企业数量和异地并购金额的对数值衡量资本跨区域流动,进行稳健性检验。

5.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考虑到本文结论会受其他同期政策实施的干扰,基于相关研究,本文进一步控制高级人民法院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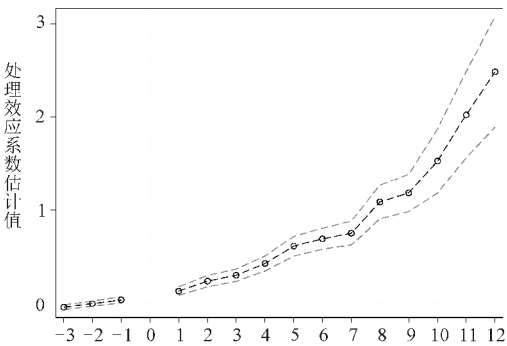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注:图中的点表示估计系数,虚线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长异地交流、高铁开通、“宽带中国”、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干扰。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且显著,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五、进一步研究

(一)机制检验

1.基于地区社会信用环境的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进一步检验文明城市创建能否通过改善地区社会信用程度,进而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为了检验上述机制,本文使用 2000 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全国各省区信任环境的问卷调查数据,计算我国省际双边信任度(Trust),该指数能够反映我国不同地区间的信任程度,相应估计结果如表 2 第(1)列所示,文明城市创建对地区社会信任环境的影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即证实文明城市创建通过改善地区社会信用程度,实现资本跨区域流动,验证了 H2。

此外,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构建了以下两个指标衡量地区社会信用环境。(1)采用王小鲁和樊纲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的市场化指数衡量地区社会信用环境水平(Market),该指数能够代表市场发育、法治建设、要素和产品市场发展的总体状况,可以反映当地社会信用环境,相应估计结果如表 2 第(2)列所示。(2)考虑在社会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当地发生公司违规和欺诈等不当行为的可能性越小,本文通过计算各城市中发生公司违规和欺诈行为的上市公司数量占当地所有上市公司的比例反映地区失信水平,作为地区社会信用环境的反向指标(Shixin),相应估计结果如表 2 第(3)列所示。上述结果均证实改善地区社会信用环境是文明城市创建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潜在作用机制。

2.基于地区政务服务的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进一步检验文明城市创建能否通过提高地区政府服务水平,进而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为了检验上述机制,本文通过各地市行政审批中心网站手工整理全国各地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相关数据,并以各地市行政审批中心进驻部门数量的对数值(ALC_Dep)和行政审批中心进驻事项数量的对数值(ALC_Item)衡量地区政务服务水平,相应估计结果如表 3 第(1)(2)列所示。文明城市创建对地区政务服务的影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即验证文明城市创建有助于提高当地政务服务水平,从而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验证了 H3。

此外,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构建以下两个指标衡量地区政务服务。(1)本文根据中国工信部于 2011 年确定的首批基于云计算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建设和试点示范地区名单,将样本城市入选“电子政务”示范城市名单的当年及其之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为 0,以此衡量地区政务服务水平(Digit_Govern),相应估计结果如表 3 第(3)列所示。(2)本文参考赵涛等的研究^[34],计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作为地区政务服务的衡量指标(City_Digital),相应估计结果如表 3 第(4)列所示。上述结果均证实提高地区政务服务水平是文明城市创建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潜在作用机制。

表 3 地区政务服务机制检验

	(1)	(2)	(3)	(4)
	ALC_Dep	ALC_Item	Digit_Govern	City_Digital
Civil	0.0499 *** (0.0031)	0.0254 *** (0.0036)	0.0501 *** (0.0023)	0.2801 *** (0.00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对/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42604	1342604	1342604	1339894
Adjusted R ²	0.9815	0.9883	0.5142	0.7402

表 2 地区社会信用环境机制检验

	(1)	(2)	(3)
	Trust	Market	Shixin
Civil	0.0523 *** (0.0034)	0.0284 *** (0.0038)	-0.0098 *** (0.00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对/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42604	1342604	1063407
Adjusted R ²	0.9635	0.9454	0.1671

(二)异质性分析

1.资本类型的异质性

尽管本文发现文明城市创建实现了资本跨区域流动,但仍需要对跨区域进入资本的类型进行更加细致讨论。为此,本文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在 2008 年印发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来界定污染行业,并基于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的经营范围,进一步筛选出污染型异地子公司样本和非污染型异地子公司样本,从而以上市公司异地设立污染型和非污染型子公司数量衡量污染和非污染资本跨区域流动。

基于资本类型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4 第(1)(2)列所示,文明城市创建仅会显著吸引非污染资本进入,而不会对污染资本进入产生显著影响。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以上市公司异地设立污染型和非污染型子公司注册资本的对数值衡量污染和非污染资本跨区域流动,相应估计结果如表 4 第(3)(4)列所示,同样支持上述结论。这意味着文明城市的创建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地方政府为实现招商引资、追求经济增长目标而放松对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视,避免通过降低异地污染企业进入门槛的方式便利异地污染企业进入和污染转移。

表 4 跨区域进入资本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污染资本	非污染资本	污染资本	非污染资本
	Cross_firm	Cross_firm	Cross_invest	Cross_invest
Civil	0.0027 (0.0023)	0.4127 *** (0.0260)	- 0.0027 (0.0107)	0.6439 *** (0.03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对/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42604	1342604	1342604	1342604
Adjusted R ²	0.1322	0.4675	0.3184	0.5165

2.城市等级和区位的异质性

本文将中国各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定义为中心城市,其余城市定义为外围城市,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5 的第(1)(2)列所示,发现只有外围城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才会显著吸引异地企业进入,从而实现资本跨区域流动。其背后原因可能在于:相比于外围城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中心城市通常具有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高的生产率,并且具有更低的资本成本,导致其相比于外围城市具有更高的资本回报率,有助于吸引资本进入,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流动的边际影响,从而导致中心城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并不会显著吸引资本进入。

本文进一步以是否具有海岸线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5 的第(3)(4)列所示,相比于沿海城市,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提升作用在内陆城市中更显著。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沿海城市不仅在营商环境、“放管服”等政策改革上领先于内陆地区,并且在自贸区、国家级开发区和产业集群的数量上也远多于内陆地区,导致沿海地区的营商和制度环境优于内陆地区,有助于吸引资本进入,这便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进入的边际影响。

表 5 城市等级和区位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外围城市	中心城市	内陆城市	沿海城市
	Cross_firm	Cross_firm	Cross_firm	Cross_firm
Civil	0.2425 *** (0.0214)	0.0748 (0.0959)	0.4184 *** (0.0305)	0.3680 *** (0.046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对/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209639	132965	1116153	226451
Adjusted R ²	0.4555	0.5072	0.4770	0.4692
组间系数差异	3356.87 ***		273.61 ***	

(三)经济后果分析

1.城市创业活力

创业活动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文明城市创建能否通过吸引异地企业进入来进一步提高城市创业活力?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为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本文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检验文明城市创建能否通过资本跨区域流动来提高城市创业活力。其中,针对城市创业活力的衡量,本文首先通过中国工商注册企业信息数据库计算出各城市当年新建企业数量,并通过逐年累加得到现存企业数量,构造基于生态学法的城市创业活力(Active_E)。其次,本文借助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计算出各城市15~64岁劳动力人口数量,从而得到基于劳动力市场法的城市创业活力(Active_L)。相应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第(1)~(3)列给出了基于劳动力市场法构造的城市创业活力(Active_L)逐步回归估计结果,证实了文明城市创建通过吸引异地企业进入、实现资本跨区域流动,进而提高城市创业活力的研究结论。表6第(4)~(6)列给出了基于生态学法构造的城市创业活力(Active_E)逐步回归估计结果,同样验证上述结论。由此可见,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提升作用能够进一步提高城市创业活力。

表 6 城市创业活力的经济后果

	(1)	(2)	(3)	(4)	(5)	(6)
	Active_L	Cross_firm	Active_L	Active_E	Cross_firm	Active_E
Civil	0.0058 *** (0.0001)	0.4154 *** (0.0260)	0.0057 *** (0.0001)	0.0055 *** (0.0001)	0.4154 *** (0.0260)	0.0054 *** (0.0001)
Cross_firm			0.0003 *** (0.0000)			0.0002 *** (0.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对/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42604	1342604	1342604	1342604	1342604	1342604
Adjusted R ²	0.6582	0.4734	0.6598	0.6609	0.4734	0.6624

2.“稳就业”效应

就业是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社会稳定以及国家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桥梁,保障就业即是守护民生之本,稳固就业则是促进发展的坚实支撑。那么,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提升作用,能否真正意义上提高当地居民就业水平?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拓宽当地政府缓解地方就业压力和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思路,也能为各地政府通过构建“城市品牌”来吸纳异地企业、缓解当地就业压力提供学理支撑。为此,本文以各城市年末从业人员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城市就业水平,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检验文明城市创建能否通过吸引资本进入来提高城市就业水平。

相应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证实了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提升作用能够进一步提高城市就业水平,最终实现稳就业的经济影响。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基于各自在区位、历史和特色产业上的优势,大力发展自身城市品牌,通过引入异地企业和投资来带动当地就业,最大化发挥城市品牌在稳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表 7 稳就业的经济后果

	(1)	(2)	(3)
	Employ	Cross_firm	Employ
Civil	0.0553 *** (0.0012)	0.4154 *** (0.0260)	0.0548 *** (0.0013)
Cross_firm			0.0013 *** (0.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对/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24766	1342604	1324766
Adjusted R ²	0.5873	0.4734	0.5875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2000—2021 年中国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数据和地级市数据,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1)文明城市创建会显著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2)改善地区社会信用环境和提高当地政务服务水平是文明城市创建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的两条潜在作用机制。(3)文明城市创建仅会显著吸引非污染型异地企业进入,而不会对污染型异地企业的进入产生显著影响,并且相比于中心城市和沿海城市,文明城市创建对外围城市和内陆城市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4)文明城市创建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提升作用能够进一步提高城市创业活力和就业水平,最终产生稳就业的经济效果。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品牌在吸引企业投资和资本进入方面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应从区位优势、历史渊源和产业结构等比较优势出发,大力发展各自城市品牌。聚焦城市品牌塑造和城市形象树立,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与综合实力,形成对外界人力、企业和技术等方面的吸引力,从而畅通资本跨区域流动。

第二,地方政府应持续提升地方政务服务水平,推进地区社会信用环境和营商环境的建设,降低异地企业进入时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和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此外,中央文明委应完善文明城市评选过程中的复查和退出机制,形成长效常态的工作机制,谨防地方政府在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开倒车”,将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和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等文明城市考核体系融入到政府治理理念,全面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第三,中央文明委在制定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城市区位和等级上的异质性,细化并实施差异化的文明城市评选政策。对于沿海和中心等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而言,应将重点放在产业结构升级、数字和信息化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同时,对于内陆和外围等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政策优惠较少的地区,应将重点放在营造廉洁公正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提高政府行政审批效率、降低异地企业进入门槛和制度性障碍,从而最大化发挥文明城市对异地资本的提升作用。

注释:

①受篇幅限制,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未列示,留存备案。

②受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留存备案。

参考文献:

- [1] Poncet, S. 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1): 1—21.
- [2] 陈家和, 吴一平, 李鹏飞. 城市品牌与流动人口就业选址决策[J]. 财经研究, 2022(5): 140—154.
- [3] 姚鹏, 张泽邦, 孙久文, 闫昊生. 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 ——基于“全国文明城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J]. 财经研究, 2021(1): 32—46.
- [4] 石大千, 胡可, 陈佳. 城市文明是否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环境规制与交易成本视角[J]. 宏观经济研究, 2019(6): 27—38.
- [5] 王雅莉, 侯林岐, 朱金鹤. 文明城市创建如何“催生”企业“道德血液”?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分析[J]. 财经研究, 2022(6): 64—78.
- [6] 余典范, 张家才, 陈磊.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资本跨地区流动吗? ——来自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证据[J]. 财经研究, 2023(12): 91—105.
- [7] He, X. The Role of Social Trust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Households in China[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2020, 2(2): 191—206.

- [8] 詹新宇,王一欢.荣誉的力量,共建共享全国文明城市增强企业纳税遵从了吗[J].财贸经济,2022(10):40—56.
- [9] Li, D., Xiao, H., Ding, J., et al. Impact of Performance Contest on Loc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Empirical Study of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Program[J]. Growth and Change, 2021, 53(2): 559—592.
- [10] 曹春方,夏常源,钱先航.地区间信任与集团异地发展——基于企业边界理论的实证检验[J].管理世界,2019(1):179—191.
- [11] Bruno, V., Shin, H. S. Capital Flows and The Risk-Taking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5, 71(3): 119—132.
- [12] Dahlhaus, T., Vasishta, G. Monetary Policy News in the US: Effects on Emerging Market Capital Flow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21, 114(5): 102403.
- [13] Fratzscher, M. Capital Flows, Push Versus Pull Factor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8(2): 341—56.
- [14] Kumar, V., Dua, P. What Explains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 Inflows to Bricks Countries? [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4, 82: 32—46.
- [15] 王媛,唐为.交通网络、行政边界与要素市场一体化——来自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23(4):1461—1476.
- [16] 刘毓芸,严翠欣,陈强远.信息壁垒与资本空间配置:方言的视角[J].世界经济,2024(6):201—224.
- [17] 曹春方,贾凡胜.异地商会与企业跨地区发展[J].经济研究,2020(4):150—166.
- [18] 江成涛,王亚雯,王玉娟.社会信用环境与资本跨区域流动——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政策和企业异地投资的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4(6):107—118.
- [19] 曹春方,刘秀梅,贾凡胜.向家乡投资:信息、熟悉还是代理问题? [J]. 管理世界,2018(5):107—119.
- [20] 胡海峰,白宗航,王爱萍.银行业竞争吸引了企业异地投资吗[J].经济学动态,2023(10):33—51.
- [21] 宋德勇,李超,李项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来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证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11):155—164.
- [22] 杨仁发,李自鑫.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吗? [J]. 财经研究,2023(8):19—33.
- [23] Guo, M., Luo, D., Liu, C. City Civilization, Employment Creation and Talent Agglome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Policy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4, 87(10): 102215.
- [24] 刘哲,刘传明.文明城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来自文明城市评选的准自然实验[J].宏观经济研究,2021(1):43—55.
- [25] Li, W., Wen, H. W. The Low-Carbon Effect of Pursuing the Honor of Civilization? A Quasi-Experiment in Chinese Cities[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3, 78(2): 343—357.
- [26] 吴海民,吴淑娟,陈辉.城市文明、交易成本与企业“第四利润源”——基于全国文明城市与民营上市公司核匹配倍差法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5(7):114—129.
- [27] 刘佳伟,邓博夫,罗正英,陶存杰.“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与企业跨区域投资布局——基于2008—2018年上市公司新增子公司地理分布的实证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4(2):35—52.
- [28] Gui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3): 1095—1131.
- [29] 逯进,赵亚楠,苏妍.“文明城市”评选与环境污染治理:一项准自然实验[J].财经研究,2020(4):109—124.
- [30] 马光荣,程小萌,杨恩艳.交通基础设施如何促进资本流动——基于高铁开通和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0(6):5—23.
- [31] 杨继彬,李善民,杨国超,吴文锋.省际双边信任与资本跨区域流动——基于企业异地并购的视角[J].经济研究,2021(4):41—59.
- [32] 胡海峰,白宗航,班元浩.银行业管制放松与地区金融科技发展[J].金融评论,2024(3):23—48.
- [33] Goodman-Bacon,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1, 225(2): 254—277.
- [34]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10):65—76.

**Do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ized Cities Promote the Cross-regional Flow of Capital:
Evidence from the Nonlocal Subsidiaries Owned by Listed Companies**

BAI Zonghang¹ WANG Shusen² TIAN Yidi³

(1. School of Financ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2.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3.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ity branding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instrument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enhancement of urban competitiveness, the attraction of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rriers to interregional capital flows. As the most prominent and challenging-to-attain city brand in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exert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ross-regional capital flows. Based on data on the off-site establishment of subsidiaries by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and prefecture-level city data from 2000 to 2021, the paper measures the cross-regional flow of capital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sidiaries by listed companies off-site. By constructing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civilized city creation on cross-regional capital flows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ized cities has a notable impact on cross-regional capital flow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ized cities facilitates cross-regional capital flows by enhancing the regional social credit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servic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reation of civilized cities not only promotes the cross-regional flow of non-polluting capital, but also restrains the cross-regional flow of polluting capital. Furthermore, the impact of civilized city creation on cross-regional capital flows is more pronounced in peripheral and inland cities than in central and coastal cities. Fin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ized cities can enhance the cross-regional flow of capital, thereby stimulat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nd employment. The article gives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utilization of city branding by governments to facilitate cross-regional capital flows and realize China's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Key words: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Policy; Cross-regional Capital Flows; Social Credit Environment; Government Service; Stabilize Employment

(责任编辑:郭 策)